

許燄輝 主編

中國語言文字研究 輯刊

花木蘭
文化出版社
出版

十二編 第五冊

支謙譯經動作語義場及其演變研究

杜 翔 著

中國語言文字研究輯刊

十二編

許燦輝主編

第5冊

支謙譯經動作語義場及其演變研究

杜翔著



T1621387

1621387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支謙譯經動作語義場及其演變研究／杜翔 著 -- 初版 -- 新
北市：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17〔民 106〕

目 2+228 面；21×29.7 公分

（中國語言文字研究輯刊 十二編；第 5 冊）

ISBN 978-986-404-979-0（精裝）

1. 漢語文字學 2. 語義學

802.08

106001502

ISBN-978-986-404-979-0



9 789864 049790

中國語言文字研究輯刊

十二編 第五冊

ISBN：978-986-404-979-0

支謙譯經動作語義場及其演變研究

作 者 杜 翔

主 編 許鈇輝

總 編 輯 杜潔祥

副總編輯 楊嘉樂

編 輯 許郁翎

出 版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社 長 高小娟

聯絡地址 235 新北市中和區中安街七二號十三樓

電話：02-2923-1455／傳真：02-2923-1452

網 址 <http://www.huamulan.tw> 信箱 hml810518@gmail.com

印 刷 普羅文化出版廣告事業

初 版 2017 年 3 月

全書字數 161391 字

定 價 十二編 12 冊（精裝） 台幣 30,000 元

版權所有・請勿翻印

支謙譯經動作語義場及其演變研究

杜翔 著

作者簡介

杜翔，男，1971 年出生，浙江省浦江縣人。2002 年畢業於北京大學，獲文學（漢語言文字學）博士學位，研究方向為漢語詞彙史，畢業後進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詞典編輯室工作至今。主要從事規範型辭書《新華字典》《現代漢語詞典》的修訂工作，擔任中國辭書學會語文辭書專業委員會秘書長。曾主持完成中國社會科學院青年資助項目「漢語動作語義場研究」，參加國家標準《漢語拼音正詞法基本規則》2012 版（GB/T 16159-2012）的修訂，研究領域為詞彙學、辭書學和語言文字應用。

提 要

支謙是三國時代最重要的佛經翻譯家，他祖籍西域而生於中土，從小兼通胡漢語言和文字，譯經比較多地保留了當時口語的面貌。本書以一個斷代的材料（支謙譯經）為座標，以語義場為研究單元，與前代文獻（主要是《史記》）、同時代的文獻（三國中土文獻和康僧會的譯經材料）和後代文獻（一直考察到現代漢語）做縱、橫兩方面的比較，重點考察與口、目、手、足等有關的 4 個以聯想關係組成的動作語義場，構成了本書四章正文內容；各章內部包含若干以同義聚合關係組成的子語義場，共計 15 個。從共時層面上考察它們內部各義位的義值、義域和義位內各義素的組成，從歷時層面上分析義位的組合、演變乃至語義場演變的情況，在漢語歷史詞彙學領域引進了語義場和義值、義域、義叢等語義學的概念，借鑒了其研究方法，把零散的詞義及演變研究納入了系統化的軌道。本書以漢譯佛典作為主要研究材料，在與同時代、前後代不同性質的文獻比較中，證實了譯經材料的語料價值和口語性質，也表明了佛教詞語與漢語基本詞彙的互動關係。



目

次

第一章 緒 論	1
第一節 支謙的生平	1
第二節 支謙譯經及其語言價值	4
第三節 語義場研究與選題緣由	7
第四節 本文的研究方法與任務	12
第五節 本文使用的術語	14
第二章 與「口」有關的語義場	17
第一節 〔飲食〕語義場	17
第二節 〔言說〕語義場	32
第三節 〔歌誦〕語義場	49
第四節 〔叫呼〕語義場	59
第三章 與「目」有關的語義場	71
第一節 〔觀看〕語義場	71
第四章 與「手」有關的語義場	89
第一節 〔執持〕語義場	89
第二節 〔取拿〕語義場	108
第三節 〔投擲〕語義場	123
第四節 〔放捨〕語義場	132
第五節 〔擊打〕語義場	141
第六節 〔引挽〕語義場	154
第七節 〔繫縛〕語義場	167
第五章 與「足」有關的語義場	177
第一節 〔踐踏〕語義場	177
第二節 〔行走〕語義場	184
第三節 〔踊躍〕語義場	197
第六章 結 語	207
第一節 三國時期漢語詞彙概說	207
第二節 語義場演變的有關問題	209
參考文獻	217
引用文獻	223
後 記	227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支謙的生平

一、三國時代佛教傳播情況〔註1〕

漢代佛教依附於黃老方術而得以流傳，並逐漸在中土紮下了根。漢末魏晉時期，社會動蕩不安，百姓的苦難與被拯救的渴望，為佛教的傳播提供了良好的土壤，一批中國本土的佛教學者脫穎而出，他們在理解消化佛教思想、融會中外文化方面做出了巨大貢獻。

東漢末年，由於崇佛的楚王劉英放逐江南以及笮融在廣陵、彭城推行佛事等，佛教的傳播範圍開始向江南擴展。由於中原一帶連年戰亂，人們大批南遷逃避戰亂，佛教僧侶也隨之來到吳國〔註2〕。同時，當時南海交通發達，佛教從海路也傳到了廣州、交州一帶〔註3〕。南北兩路佛教傳播路線彙集於吳地，吳都建業成為與魏國洛陽並駕齊驅的佛教中心。

〔註1〕 本段內容參考了許理和（1972）、鎌田茂雄（1980）的有關論述。

〔註2〕 本文所研究的著名佛經翻譯家支謙就是隨避難的人群來到吳國的。

〔註3〕 三國時代另一位著名僧人康僧會就是在交趾出家為僧後北上吳都建業的。

二、支謙的身世

三國時代的佛事活動與東漢一樣，仍以譯經為主，支謙和康僧會是這一時期主要的翻譯家。他們都是祖籍西域而生於中土，深受中土文化的影響。兩人相比，支謙的譯經數量遠比康僧會可觀，荷蘭漢學家許理和（1959，第68頁）稱支謙為「公元4世紀末中國南方唯一重要的翻譯者」。現存最早的佛教經錄——梁代僧祐《出三藏記集》中收有支謙的傳記，全文不長，但是內容十分全面，涉及支謙的生平、譯經情況以及當時的社會文化背景，後代有關支謙的介紹都不出這段文字記載的內容，現全文抄錄於此：

支謙，字恭明，一名越，大月氏人也。祖父法度，以漢靈帝世，率國人數百歸化，拜率善中郎將。越年七歲，騎竹馬戲於鄰家，為狗所齧，脛骨傷碎。鄰人欲殺狗取肝傅瘡，越曰：「天生此物，為人守吠，若不往君舍，狗終不見齧。此則失在於我，不關於狗。若殺之得差，尚不可為；況於我無益，而空招大罪。且畜生無知，豈可理責？」由是村人數十家感其言，悉不復殺生。

十歲學書，同時學者皆服其聰敏。十三學胡書，備通六國語。初桓、靈世，支識譯出法典，有支亮紀明資學於識，謙又受業於亮。博覽經籍，莫不究練，世間藝術，多所綜習。其為人細長黑瘦，眼多白而睛黃，時人為之語曰：「支郎眼中黃，形體雖瘦是智囊。」其本奉大法，精練經旨。獻帝之末，漢室大亂，與鄉人數十共奔於吳。初發日，唯有一被，有一客隨之，大寒無被，越呼客共眠。夜將半，客奪其被而去。明旦，同侶問被所在，越曰：「昨夜為客所奪。」同侶咸曰：「何不相告？」答曰：「我若告發，卿等必以劫罪罪之。豈宜以一被而殺一人乎？」遠近聞者莫不歎服。

後吳王孫權聞其博學有才慧，即召見之，因問經中深隱之義。越應機釋難，無疑不析。權大悅，拜為博士，使輔導東宮，甚加寵秩。越以大教雖行，而經多胡文，莫有解者，既善華戎之語，乃收集眾本，譯為漢言。從黃武元年至建興中，所出《維摩詰》、《大般泥洹》、《法句》、《瑞應本起》等二十七經，曲得聖義，辭旨文雅。又依《無量壽》、《中本起經》，製《贊菩薩連句梵唄》三契，注《了

本生死經》，皆行於世。

後太子登位，遂隱於穹隆山，不交世務，從竺法蘭道人更練五戒。凡所遊從，皆沙門而已。後卒於山中，春秋六十。吳主孫亮與眾僧書曰：「支恭明不救所疾，其業履冲素，始終可高，爲之惻愴，不能已已！」其爲時所惜如此。

——梁·僧祐《出三藏記集卷十三·支謙傳第六》

從上述記載我們知道，支謙是一名居士，他是漢靈帝（168～188年）時定居洛陽的月支人之孫，獻帝（189～220）末年避戰亂來到吳國。文中記載了支謙的四段經歷：幼年時爲狗所齧而不怪罪於狗，避亂途中呼客共眠、客反奪其被而不告發此客，支謙奔吳而得吳主孫權禮遇，支謙卒後吳主孫亮惻愴惋惜而與眾僧書。前兩段經歷反映的是他的慧根與「諸惡莫作，眾善奉行」的人生道德實踐，後兩段則證明了支謙與王室的交往以及佛教與王室之間的聯繫。

此外，上述文字還記載了支謙在譯經注釋和佛教唱贊（梵唄）上所做的貢獻。根據呂澂先生（1979，第292～293頁）的研究，支謙曾將所譯有關大乘佛教陀羅尼門實踐的要籍《無量門微密持經》和兩種舊譯（《阿難陀目佉尼呵離陀鄰尼經》、《無端底總持經》）對勘，區別本（母）末（子），分章斷句，上下排列，首創了「會譯」的體裁，後來支愍度的合《維摩》、合《首楞嚴》，道安的合《放光·光贊》，都取法於此。支謙偶而也給自譯的經加以自注（如《大明度無極經》首卷），自注的辦法能濟翻譯之窮，使原本的意義顯豁明白。支謙又深諳音律，留意經文中讚頌的歌唱。他創作的《贊菩薩連句梵唄》三契，在梁代以前就失傳了，但他這一創作對於贊唄藝術的發展是有相當影響的。被稱爲始製梵唄的曹植，可能是受了支謙作品的啓發而有了《瑞應本起》四十二契的巨構，成爲學者之所宗。荷蘭漢學家許理和（1972，第69、76頁）認爲梵唄的首創者是支謙，而認爲由曹植始製梵唄的說法是僞說。

支謙10歲學書，13歲學習胡書並掌握了6門外語，在洛陽他受業於支謙的弟子支亮，被時人稱爲「智囊」。他感到佛教雖然在中土流行，但當時佛經多用胡文記載，沒人能解讀，支謙便利用自己會華戎多種語言的優勢，收集眾本，開始了佛典翻譯事業。

第二節 支謙譯經及其語言價值

一、支謙譯經概況

支謙家族於何代入華，諸說紛歧。從支謙本人，到其父，乃至祖父，皆各有所本。據鄧攀（2008）研究推斷，由支謙師承來看，支謙於「漢桓、靈之世，來在中國」，支謙為其再傳弟子，自然不可能學成後「來遊漢境」，支謙應該在漢地出生。對於一個在漢地出生、成長直至老死的外族人來說，其漢語能力和水平不會比普通漢人差。受其祖輩的影響，他又能通大月支語，「越以大教雖行，而經多胡文，莫有解者，既善華戎之語，乃收集眾本，譯為漢言。」所以支謙譯經中的非漢語成分要比其它譯經少得多。支謙、康僧會的譯經裏大量使用了口語詞。譯者選擇豐富多彩的口語詞把故事情節描繪得風趣生動、栩栩如生。讀者在欣賞作品文學之美的同時，也不禁歎服譯者駕馭漢語的不凡能力。漢語史的研究者更能從中探索各種語言現象，如新詞新義、同義詞的比較、構詞的規律、佛教詞對口語詞的影響等等。

支謙的譯經與前代譯家重質樸的風格有所不同，他出於更好地暢達經意使人易解的緣故，他的譯經「曲得聖義，辭旨文雅」，「所有文獻都顯示了他的語言精熟和風格優雅」（許理和，1972，第68頁），推動了佛教在中土的普及和流行。支愍度在《合首楞嚴經記》中說：「越，才學深徹，內外備通，以季世尚文，時好簡略，故其出經，頗從文麗，然其屬詞析理，文而不越，約而義顯，真可謂深入者也。」但是支謙的翻譯中採用的一些方法（如：過於文飾，包括專有名詞在內逐字直譯成漢語，刪節原文中冗長的敘述和無休止的重複等）受到了一些人的批評。道安認為支謙的譯經雕琢得很精巧，但這樣也有可能影響到經典原義的準確表達，他說支謙譯經「巧則巧矣，懼竅成而混沌終矣。」其實，正像呂澂（1979，第294頁）所說的「要是從佛典翻譯發展的全過程來說，由質趨文，乃是必然的趨勢。支謙得風氣之先，是不能否認的。」

《出三藏記集》記載支謙翻譯的佛經有27部，呂澂在《新編漢文大正藏目錄》一書中把支謙與來自印度的譯師竺將炎合譯的2部譯經也歸入支謙名下，把支謙譯經擴大為29部（詳細篇目見文末引用文獻）〔註4〕。本文採用

〔註4〕 季琴（2004）按照許理和的做法，暫不把《出三藏記集》記載的支謙翻譯的27部

呂澂先生的說法，把這 29 部譯經作為本文的研究材料，總字數為 36 萬。

二、支謙譯經的語言價值

把東漢—隋這一階段作為漢語發展史上一個相對獨立的時期並稱之為「中古漢語」已經得到學術界的認可。由於語言自身的發展和語言外部的多種因素的影響，這一時期的漢語詞彙發生了急劇而重大的變化，許多先秦使用的詞語產生了新的意義，同時唐宋以後近代漢語中的不少新詞新義又可以在這個時期找到源頭。從書面語與口語的關係來看，中古時期是言文分離的過渡階段。呂叔湘先生（1985）認為：「秦以前的書面語和口語的距離估計不至於太大，但漢魏以後逐漸形成一種相對固定的書面語，即後來所說的『文言』。」中古時期是漢語發展史上的一個重要時期，太田辰夫（1991，第 10 頁）認為：「中古，即魏晉南北朝……這個時期是中古漢語的質變期。」

反映東漢三國時代口語面貌的文獻並不多見。學者們的研究成果表明，漢譯佛經、民歌、史書中的一些對話、私人書信等反映口語程度較高；詩歌、某些文人著述、對前代典籍的注疏材料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口語情況；至於典雅文言作品如正規詔書、文人賦頌作品等就很少反映口語面貌了。就中土文獻而言，東漢時期重要文獻是《論衡》，三國時代已經結集的有馮欽立的《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中的《魏詩》、清代嚴可均的《全三國文》。《論衡》出自同一作者，年代明確，用語淺易，是漢語史研究的重要文獻；《魏詩》和《全三國文》作者不一、文體各異，反映的口語程度參差不齊，無法作為一個斷代的純粹語料來使用。

相對於中土文獻而言，佛經早在晉代就有目錄，它的譯者、年代明確；同時，佛教的宣傳對象是普通大眾，譯者通曉的是漢語口語，又沒有現成的文言譯經範式可供模仿，決定了佛經具有很強的口語性質。自東漢開始有佛經漢譯到三國時代，支謙是譯經最多的人。東漢譯家安世高翻譯的多為小品經，支婁迦讖翻譯的佛經雖不乏篇幅較大者，但數量上也不能與支謙比肩，三國時代與支謙同時的主要譯家康僧會，他翻譯並現存的佛經是《六度集經》（字數約 8

佛經中的《菩薩本緣經》、《佛醫經》、《撰集百緣經》這 3 部譯經視作支謙譯經。季琴所列的支謙譯經只有剩下的 24 部佛經。

萬)，數量上也遠不及支謙譯經。支謙與他的前輩相比，支謙在中國出生，並從小兼通胡漢語言和文字，在文化修養上比他們具有明顯的優勢，譯風流暢，他的譯經比較多地保留了當時口語的面貌。東晉支愨度說：「越才學深澈，內外各通，以季世尚文，時好簡略，故其出經，頗從文麗。然其屬辭析理，文而不越，約而義顯，真可謂深入者也。」（《出三藏記集序卷第七》）支謙集譯、注佛經於一身，所譯經典的最大特色是在「深入」原著的基礎上，力求文麗、簡約，並且爲了適合漢人的口味，多用意譯代替音譯，改變了東漢譯經尚質的傾向，開創了佛教翻譯史上的「文麗」派。

程湘清先生（1992，代序）曾提出判斷專書選擇是否恰當的三個條件：第一要看口述或撰寫某部專書的作者是否屬於該斷代；第二，要看專書的語言是否接近或反映該斷代的口語；第三，要看專書的篇幅大小是否具有相當的語言容量。比照程先生的三個條件來衡量，支謙譯經是作爲專書乃至於作爲三國時代斷代詞彙研究的難得材料。

利用東漢時期的重要文獻《論衡》和佛經材料，已有人做過比較系統的研究。據筆者所知，北京大學胡敕瑞（1999）、浙江大學史光輝（2001）的博士學位論文選題分別是《〈論衡〉與東漢佛典詞語比較研究》、《東漢佛經詞彙研究》。但到筆者做學位論文爲止，尙未見有人主要利用支謙譯經的材料對三國時代的漢語詞彙做專書斷代的研究。在筆者之後，利用支謙譯經做詞彙研究的博士學位論文有兩篇。一篇是季琴的《三國支謙譯經詞彙研究》（浙江大學 2004 年，方一新教授指導），該文以支謙譯經爲研究對象，通過調查先秦漢魏晉南北朝時期有代表性的文獻，運用描寫和比較的方法，對譯經中的詞彙做了系統性的研究，旨在進一步發掘支謙譯經的研究價值與意義。另一篇是楊同軍的《支謙譯經複音詞研究》（四川大學 2006 年，項楚教授指導），該文論證了支謙譯經在漢譯佛經史上和漢語詞彙史上都具有承前啓後的作用和重要的研究價值，以最能體現支謙譯經詞彙特點的複音詞爲研究對象，首先在共時系統內分出普通詞語、佛教詞語、專名詞語以展現它的詞彙構成；然後分先秦時代、西漢時代、東漢時代、三國時代四個時期對這些複音詞進行了歷史來源的考察。

本文選取支謙譯經來研究支謙譯經乃至三國時代的面貌，屬於專書斷代研究的範疇，專書研究是斷代研究的基礎，斷代研究又是整個漢語史研究的基礎，

這是漢語史研究的一項基礎工作。本文的研究將在這一方面做點實際的努力。

佛經的翻譯主要在東漢至唐代，漢譯佛典大多保存在大藏經中。北宋太祖開寶五年（971年）刻成的《開寶藏》是我國歷史上第一部刻本大藏經，此後的刻本皆以其為準據。1251年刻成的《高麗藏》再雕本以《開寶藏》本、《高麗藏》初雕本與契丹本互校，在古代刻本各藏中推為精本。1934年印成的日本大正《大藏經》以《高麗藏》再雕本為底本，以宋、元、明三藏和宮本、敦煌寫本等不出校勘，是繼《高麗藏》後又一精本。本文研究中採用的佛典材料採用日本《大正藏》，如與別的版本有異文，隨文注出。

第三節 語義場研究與選題緣由

一、漢語詞彙史研究的回顧與現狀

從學術界目前的研究現狀來看，常用詞和語義場的演變研究已經引起了學者重視，也取得了豐碩的成果。王力先生在詞彙史以及常用詞研究上有首倡之功，在上個世紀40年代王先生就發表了《古語的死亡殘留和轉生》（1941）、《新訓詁學》（1947）等重要論文，論述了古語死亡的四種原因，提出了「新訓詁學」（其實就是詞彙史），後來又在《漢語史稿》（1958）又描寫了若干組常用詞演變的脈絡。但是王先生在詞彙史上的這一倡導沒有得到應有的回應。

語義場的研究始於20世紀二三十年代的德國和瑞士的一些結構主義語言學家，很多語言學家對詞項的研究從個別詞項的無系統研究轉入對詞彙結構的系統研究。語義場理論突破了過去原子主義的研究方法，主張用聯繫的觀點研究語言系統的同義性，開創了語義研究史上的新階段。運用語義場理論能夠詳細描寫同義、反義、部份—整體義等關係，逐漸被漢語學界吸收借鑒。

80年代以來，蔣紹愚先生引入了現代語義學理論，應用義位、義素、語義場等理論分析詞義、詞彙現象，多次論及常用詞演變、詞彙系統研究等問題，研究成果主要見諸《古漢語詞彙綱要》（1989）、《蔣紹愚自選集》（1994）、《漢語詞彙語法史論文集》（2000）、《漢語歷史詞彙學概要》（2015），在從理論和實踐上推動了漢語詞彙史的發展。張永言、汪維輝《關於漢語詞彙史研究的一點思考》（1995）強調在詞彙史研究上應該把常用詞的研究放在中心的位置，對改變當時詞彙史研究中畸輕畸重的局面起到了作用。此後幾年，李宗江《漢語常

用詞演變研究》(1999)和汪維輝《東漢—隋常用詞演變研究》(2000)相繼出版，集中代表了當前常用詞演變研究方面的水平。汪著集中考察了中古時期 41 組常用詞，是迄今為止專門研究常用詞交替性演變所涉及的詞數最多、面最廣的一家(李宗江，1999，第 70 頁)。但是誠如王雲路、方一新先生(2002)給該書所做的書評中所說的「進行的是常用詞的更替研究」，考察時著眼點在於新詞對舊詞的更替過程，描寫的重點放在新義位的各種用例上，而對舊義位用例的考察、新舊義位之間的比較和它們在語義場中位置的變化等方面尚顯欠缺。

二、以語義場為單位研究漢語詞彙的必要性

我們知道，語言是一個非常嚴密的特殊符號體系，從結構上看，是由語音、語法、語義三部份組成的，每個部份又自成一個系統。語義相對於語音、語法，有很多不同之處：它與極為複雜的客觀世界聯繫密切，單位之間關係最複雜；它是精神方面的東西，不能直接觀察到、接觸到；它是一個開放系統，既有相對穩定的方面，又常常變化。語義是語言中最複雜、最難研究的一部份。(賈彥德，1992，第 17~22 頁)

上個世紀 80 年代以來，不少學者引進結構主義語言學理論對漢語的語義(詞彙)進行研究，如運用義素分析法來分析詞義的結構，運用語義場理論來研究義位與義位之間的關係，取得了可喜的成績。根據結構主義語言學理論，一個詞(或義位)保存或出現在詞彙系統中，取決於它的存在價值(value)。這種價值主要是由它與別的相關詞(或義位)之間的區別特徵或對立特徵顯示的。索緒爾(1916，第 160 頁，第 161~162 頁)說：「語言既是一個系統，它的各項要素都有連帶關係，而且其中每項要素的價值都只是因為有其它各項要素同時存在的結果。」「在同一種語言內部，所有表達相鄰近的概念的詞都是互相限制著的。」張志毅、張慶雲(2001，第 77 頁)指出：「語義場的概念有廣狹之分。多用廣義的：以共性義位或義素為核心形成的相互制約的具有相對封閉域的詞或義位的集合，主要是聚合關係，如人類義場、人體義場、面部義場、多義義場、構詞義場、偶而指組合關係，即組合義場。」由此可見，研究漢語詞彙史，只對單個詞(或義位)做孤立的研究是不夠的，還必須研究詞(義位)之間的關係。一種語言是由千百個不同層次的語義場組成的語義整體網絡系統，進行漢語詞義系統的研究是漢語詞彙研究中的一個重大課題。

蔣紹愚先生（1994b，第 287 頁）說：「在我們還無法描寫一個時期的詞彙系統的時候，只能從局部做起，即除了對單個的詞語進行考釋之外，還要把某一階段的某些相關的詞語（包括不常用的和常用的）放在一起，做綜合的或比較的研究。」蔣先生說的這一意見實際上就體現了以一個斷代材料為座標、以語義場為單位來進行漢語詞彙史研究的思想。後來，蔣先生又提出以概念場為背景研究漢語詞彙系統及其歷史變化。如在新著《漢語歷史詞彙學概要》（2015，第 390 頁）中詳細介紹這種研究方法，引述如下：「為什麼要以概念場為背景呢？因為，漢語發展的不同時期詞彙系統的面貌是不同的，成員不同，分佈不同，從而結構也有所不同。怎樣把兩個或幾個不同歷史時期的詞彙系統加以比較呢？打一個比方，兩塊花樣不同的地毯，怎樣比較？最好的辦法是把它們鋪在同一塊有地板磚的地面上，以地板磚的格子為座標，就能很清楚地顯示兩塊地毯的不同。要比較不同時期的漢語詞彙詞義系統，最好把它們覆蓋在同一概念場上。」一種語言是由千百個不同層次的概念場組成的概念整體網絡系統，以概念場為單位研究漢語詞彙與常用詞興替是詞彙研究中的重要任務。但是語義和概念不能截然分開，萊昂斯（1978，第 225～226 頁）根據詞彙場、語義場理論，曾論及「概念場」和「詞彙場」的區別與聯繫，指出，一個詞指示一個概念區（Conceptual Area），一種語言所有某方面的詞彙組成一個詞彙場，這些詞所指示的概念區合起來成為一個概念場（Conceptual Field），詞彙場覆蓋（Cover）概念場。蔣紹愚先生（2015，第 401 頁）指出：「如果把各個歷史時期的詞彙放到概念場上，一些詞覆蓋了一些概念，那麼，這些詞就是這些概念的語言表達形式。」本文側重研究在動作概念場上的詞彙興替與語義變化情況，仍沿用「語義場」的概念。

上個世紀 90 年代以來，一批從語義場角度來考察漢語詞彙面貌的題目作為學位論文的選題獲得通過，如北京大學呂東蘭（1995）的《漢語「觀看」語義場的歷史演變》、崔宰榮（1998）的《漢語「吃喝」語義場的歷史演變》，華中師範大學劉敏芝（2000）的《「二拍」商業詞彙研究》等，這些論文從不同時代對不同的語義場做了考察，豐富了漢語詞彙系統研究和常用詞研究方面的學術成果。孫淑娟（2012）曾綜述近年來古漢語概念場研究情況，可參考。

當前，漢語詞義演變研究已經從原子觀推進到整體觀，從個體、孤立、分

散的研究推進到系統研究，以語義場為單位來研究詞彙，能夠從宏觀角度整體、系統地觀察詞義演變，是順應這一總的趨勢的。正如李宗江（1999，第74頁）所說的「以語義場為單位的研究在常用詞演變研究中應佔據中心位置，無論就漢語科學的詞彙史的建立，還是有利於詞彙教學以及漢語詞彙理論體系的建立都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三、認知科學對語義研究的推進〔註5〕

傳統語義學理論（包括上文談到的結構主義語言學理論）在詞彙層面上主要研究詞如何與客觀現實相對應而獲得意義，同時也研究詞與詞之間的關係，重視在系統中考察詞的價值和詞義的範圍，但是這種語言理論沒有對語言和人的心理之間的關係給予足夠的重視。上個世紀80年代以來在美國和歐洲興起了認知語言學，這種理論在語義研究上認為語言的意義在於人類如何對世界進行範疇化和概念化。世界上所有事物和現象都有它的特性，人們根據這些特性來認識事物，但經過認知加工後的世界是主客觀相結合的產物，是認知世界，因此不可能是完全客觀的。這種主客觀相互作用對事物進行分類的過程即範疇化的過程（categorization），其結果即認知範疇（cognitive category）。範疇化是人類對世界萬物進行分類的一種高級認知活動，在此基礎上人類才具有了形成概念的能力，才有了語言符號的意義。

傳統範疇理論認為共有特徵決定範疇的成員地位，根據某些特徵的存在與否即可決定其範疇。認知心理學的最新研究表明，範疇化的過程是複雜的、模糊的認知過程，而不是簡單的、明確的。從認知的角度看，所有範疇都是模糊範疇（fuzzy categories），含義有二：一是同一範疇的成員不是由共同特性決定的，而是由家族相似性所決定的，即範疇成員之間總是享有某些共同特性；二是可以根據成員享有共同特性的多少來決定成員的身份，其中享有更多共同特性的成員為該範疇典型的和中心的成員，即原型，其它成員為非典型成員或邊緣成員，因此，範疇的邊界是不明確的，在邊緣上範疇之間互有交叉。

認知科學發現，大腦對事物進行分類和組織時是從基本範疇層面開始的。基本範疇是心理相關等級（psychologically relevant level），在此等級上，大腦的

〔註5〕 本文有關認知語言學的理论主要參考了張敏（1998）、趙豔芳（2001）的論述。

經驗範疇與自然界的範疇最接近、最匹配，最容易被感知和記憶。範疇形成的同時產生了詞彙範疇，基本範疇對應於基本範疇詞。基本範疇詞多是詞形簡單、音節較少的不可分析的本族詞，屬中性詞，使用頻率最高，構詞能力最強。它的數量有限，大體固定，但在它們的基礎上用合成法和派生法組合的非基本等級詞可以說是無限的。

認知語言學的上述觀點給漢語語義研究帶來了極大啓示。具體到語義場研究中，結構主義語言學認為語義場中的義位之間互相決定其價值，它們之間具有馬賽克式的明確的界限，而語義場之間也是可以界定的。而根據認知語言學的觀點，一方面，語義場作為一個範疇與別的相關範疇之間沒有明確的界限或界限很難界定，語義場下每一個義位之間的界限也是模糊的；另一方面，基本範疇詞在語義場中處於凸顯地位。基於這些認識，本文在對語義場、義位的具體考察分析中，將充分考慮語言使用者認知上的因素。

按照結構主義語言學原理界定的語義場中，有一類是由一組具有上下位關係的同義義位聚合，在這類語義場中處於上位地位的那個義位往往就是基本範疇詞，這些義位組合能力強，使用頻率高，歷史上一直保持穩定，是構成基本詞彙的基礎。在本文將要考察的語義場中，如〔觀看〕語義場中的「觀」、「看」，〔取拿〕語義場中的「取」，〔擊打〕語義場中的「擊」、「打」等都屬於基本範疇詞。

四、考察範圍限於動作語義場的原因

本文考察範圍限於支謙譯經中與「口」、「目」、「手」、「足」等有關的4個以聯想關係組成的動作語義場，為什麼本文把考察範圍限於動作語義場呢？這齣於三方面的考慮：

第一，各義位所表示的事物古今一貫。概念的一致是考察「概念如何改變名稱」的前提條件，與人體器官有關的動作就存在於人們的日常生活中，從來沒有隨著時間的推移而增加或消失。同時，由於這些義位所對應的詞屬於漢語基本詞彙的範疇，研究這些義位有助於漢語詞彙基本面貌的描寫。同時，佛教文獻的口語性和內容取材於生活的特點決定了它與人體器官有關動作詞彙的豐富性。

第二，各義位所對應的詞的單音節性。張永言先生（1982，第99頁）指出，